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

刘涤源 傅殷才

一 “两个剑桥之争”的由来和实质

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下简称《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他的门徒们纷纷对就业理论和政策进行解释、补充和修订,企图加以发展。后凯恩斯学派^①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P·A·萨缪尔森、J·托宾和R·索罗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是以英国J·罗宾逊、N·卡尔多、P·斯拉法等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个支派在凯恩斯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双方主要代表人物均同两个学术名城——“剑桥”(Cambridge)有关。罗宾逊出身于英国剑桥大学,长期在该校任教,属于剑桥传统。萨缪尔森和托宾等均出身于位于美国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是美国老一辈凯恩斯主义者A·H·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等现任位于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人把这场论战称为“两个剑桥之争”。^②

双方分歧甚为显著,论争相当激烈。罗宾逊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到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把美国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看作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指责它把凯恩斯理论庸俗化了。而萨缪尔森等则自命他们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主要的正统的学派,甚至是当今唯一的学派,把新剑桥学派视为“异端”。在这场论战中,英国“剑桥”采取攻势,罗宾逊是立将;美国“剑桥”处于守势,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备受责难,特别是萨缪尔森那本风行西方各国、以“新古典综合”为内容的《经济学》教科书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但应当强调指出,两个支派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均属于凯恩斯学派。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卫护士,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拥护者,对凯恩斯就业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内容都是信奉的。他们在下列论点,彼此之间并没有分歧,或基本上没有分歧:

(1) 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放任情况下有大量“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并用“有效需求原理”来解释这种失业,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这种失业产生的原因。

(2) 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整个就业理论的实体。总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在没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即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总是有效需求不足,以致不能达到充分就业。反之,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条件下,只要国家能够以“充分就业”为目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刺激“有效需求”,“充分就业”就能够实现。

(3) 有效需求总量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就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使然。

(4) 在消费需求方面,就短期而论,消费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收入量的变动,而不是由

于一定收入下消费倾向的变化。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要大量增加殊为不易，于是转而强调投资在增加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样，在消费倾向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投资就成为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的关键性变数。在这种前提下，只有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增加。

两个支派在理论观点上和政策建议上虽有上面一系列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明显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非难，彼此攻讦，有时甚至弄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列宁曾经指出：“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利于唯物主义的。”^③这个哲学上的原理也完全适应于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研究和分析这两个支派的分歧是很必要的，在下面几个部分，我们就几个主要分歧加以介评。

二 同新古典经济学说综合调和，还是进一步决裂？

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不论在假定前提方面，还是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方面，都同前此的传统旧学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说是相决裂的。他在《通论》的“原序”中承认，他在建立并表述其新就业理论时，对摆脱“传统的想法和说法”，殊为不易，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挣扎”。他写道：“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④

摆脱旧学说，就是意味着：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派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传统自由放任学说相决裂，摒弃萨伊定律和健全财政原则，建立新学说，就是建立以“就业不足”为前提，以有效需求不足为核心，以强调扩大政府支出和赤字预算的政府干预为“反危机”主药的就业一般理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原理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心理规律，组成其新的就业一般理论，同旧的传统经济学说处于一种背离和决裂的关系。这是“凯恩斯革命”的主流。

但是，另一方面，凯恩斯对他所决裂的传统经济学说，又作了自相矛盾的评价和论断。他在《通论》的“原序”中指出，正统经济学说的错误不在于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故不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但其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是很少可非议的。他在《通论》末章更进一步说“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凯恩斯本人关于就业一般理论同传统的新古典派学说的关系的上述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既说要坚决决裂，又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综合调和。论战双方对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论断和评价，抱着迥然不同的态度。

美国剑桥派信奉后一论断，认为通过扩大政府开支，由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邦储备银行）创造所必需的购买力，就可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达到“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也就满足了传统经济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假定前提，“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这样，后凯恩斯主流派，特别是萨缪尔森就编制出“新古典综合”——把作为凯恩斯理论核心的收入分析和作为新古典派理论核心的价格分析调和起来。萨缪尔森曾一度把他的经济学定名为“新古典综合”，由于受到来自各方的非难，后改名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但在实质内容上，仍然是微观经济学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派均衡价格理论同凯恩斯主义收入决定理论的综合和调和。

萨缪尔森认为，战后，西方各国产量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本主义说来，是史

无前例的。同时，出现了同“充分就业”差不多的产量水平。因此，他在其《经济学》最近几版（如第9—11各版）中，硬说“富裕中的贫困”已属“陈旧过时”；全书中已经找不到“有效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等词汇。在他看来，“充分就业”已经成了当今西方各国的经济现实。这就是说，满足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假定前提的经济条件。凯恩斯所说“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这个论断，现在已经完全适用了。根据这种判断，萨缪尔森确认微观经济学仍然有其现实妥当性；微观经济学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能够填平，两者可以综合为一体了。

由此可见，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不再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说相决裂，而是把凯恩斯以收入分析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同马歇尔以价格分析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加以综合，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折衷调和、空前庞杂的大杂烩。

同美国剑桥派相反，英国剑桥派对凯恩斯的前述论断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罗宾逊对凯恩斯关于通过财政金融政策达到充分就业，“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这种论断，坚决回绝说：“这里，令人遗憾的是，凯恩斯发表了考虑不充分的，完全与他的主要论点相反的意见。”^⑤

罗宾逊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态度是坚持要同传统经济学说决裂，而且是进一步决裂。她坚决反对美国剑桥派的下列论点：只要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的政府干预，具有足够的投资，弥补了私人开支的有效需求之不足，使生产总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则从这一点开始，传统旧学说、特别是在“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这两大问题上的理论，“仍是无可非议”。罗宾逊把这种观点谴责为“在最纯粹的形式上的冒牌凯恩斯理论”。

罗宾逊还进一步指出，后凯恩斯主流派把“过度储蓄”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缺点”，并以为通过政府干预就得以克服，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萨伊定律，进而在它的掩护下，偷偷地恢复所有旧经济学说。她坚决反对这种倒退，反对把新旧经济学说混合在一起，并尖锐地指出，由于把凯恩斯理论庸俗化，并把新旧经济学说凑合在一起，经济学家们已经提不出头脑清醒的政策建议了。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两个“剑桥”对凯恩斯自相矛盾的论断所抱态度之不同，只不过是引起这个分歧的导火线，实际上，它有更深层的缘由。这就是研究对象不同：一方以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对象，另一方却以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对象。

美国剑桥派处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能不注意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的，但它主张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说相综合调和，实际上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的。否则，二者势必无法进行综合调和。大家知道，马歇尔虽然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但他的经济学说体系还是基本上留恋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把垄断看成例外情况，从而信奉萨伊定律，依靠市场供求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以自由放任为准则。当前的美国剑桥派，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

英国剑桥派则不同，以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作为分析对象，不再以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为前提，承认垄断统治，强调对未来的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否定市场价格机制能使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调节而趋于稳定。因此，它必然同新古典派那样仍然以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而编制的理论格格不入。

两个“剑桥”究竟哪个正确呢？是主张同新古典经济学说综合调和的美国剑桥派，还是要

进一步决裂的英国剑桥派？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争论十分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归根结底，他（她）们不过是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兜圈子而已。这首先是因为他（她）们所坚持和维护的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为垄断资本辩护的“理论”，是垄断资本发财“生意经”的概括，是极端庸俗的。但是，应当指出，罗宾逊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反对返回到十九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反对同新古典经济学说综合调和，坚持同传统经济学进一步决裂，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比萨缪尔森是要略胜一筹的。

三 历史观还是均衡观？

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引进历史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考虑现实经济生活的特点——昨天与明天的区别，强调对未来的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并且，正是由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资本边际效率才会有急剧的变动，使经济周期不断发生。他认为，“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连系这一点产生的。”货币经济同持久性设备的存在相配合，加强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因为有持久性设备之存在，所以未来与日前在经济上发生连系。人们对未来之预期，亦先影响持久性设备之需求价格，再影响现在。”这就使雇主进行投资，只能凭对未来的预期作出决策，舍此别无他法。

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的上述“历史观”有很大背离和变异。他在《经济学》中把凯恩斯的收入分析理论和马歇尔的价格分析理论加以综合，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混合起来。他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以均衡观念为中心的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把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三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完全竞争”价格理论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通通拼凑在一起。具体说来，这种背离和变异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虽也谈到“不确定性”与“预期”，但十分简短，轻描淡写，很不重视。他却特别强调均衡及其稳定性，断言“最后的竞争性均衡，是一个有效的均衡。”他确认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是“一种逐步接近均衡的价格和生产的制度”。通过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同时解决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经济问题。他还确认，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制度而达到均衡，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条不紊的一种经济秩序，它行得通。总之，萨缪尔森把均衡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二，他把微观经济学同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二者都以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他的微观经济分析，基本上继承了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以及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分配理论——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至于他的宏观分析，也强调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如果两者不均衡，则企业家将改变其生产与就业水平，从而使经济体系回复到均衡状态。在这里，应当指出，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这样强调均衡观，确实背离了凯恩斯特别重视的历史观——时间的存在，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第三，关于储蓄同投资两者间的关系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虽也轻描淡写地提到储蓄和投资两者互相分离，以及投资的极端易变性，但强调的是“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的交点决定着收入的水平”。①这就意味着，萨缪尔森背离了凯恩斯关于“投资支配储蓄而不是储蓄支配投资”的基本论点，而恢复了“储蓄支配投资”的旧均衡观点。他是用两种办法来恢复这种均衡观的：（1）通过企业家对投资和就业水平的调节，最终使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点；（2）通过宏观经济的财政金融政策安排足够的投资去吸收这笔储蓄。他认为，只要做到这一步，就万事大吉了。

罗宾逊则完全不同，她坚决信奉历史观，摒弃均衡观，认为凯恩斯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此。她写道：“从理论方面来说，革命在于从均衡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⑥罗宾逊认为，以均衡观为中心思想的马歇尔微观经济分析同以历史观为中心思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是互不相容的。她坚决反对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反对建立单一商品世界的经济模型，甚至把它斥之为“最奇怪的事情”。罗宾逊这种严厉指责所依据的理由是：（一）它抽掉了“货币巧妙地联系未来与现在”这个凯恩斯论点，把货币单纯地变成通融国债、创造所需购买力的工具。这样，就消除了未来与过去之间的差别，人们凭理性原则办事，错误总可避免，均衡总可得到纠正。她认为，这完全违反了凯恩斯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中心思想。（二）它抹煞了货币工资与实物工资的区别，而由于“易适应的”资本，劳动需求便依存于工资水平。因而，凯恩斯工资理论和就业理论被窒息了，均衡理论却再次受到崇拜。总之，罗宾逊认为，新古典学说本身在逻辑上虽算是一种“美妙、精密技巧”的理论，但其致命性的错误在于试图抽掉“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的事实来研究现状”。

罗宾逊坚决信奉凯恩斯“投资支配储蓄”的观点，反对萨缪尔森用“变戏法”的方式把“储蓄支配投资”的传统观点恢复过来。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认为，任何时候可以作为投资的储蓄额是一定的，投资是受储蓄支配的；而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与储蓄是由两种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进行的，两者彼此分离。投资由投资公司、企业家根据对未来的预期作出决策，不受居民储蓄的支配。居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减少，并不增加投资，而只能使就业减少。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收入和就业。她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摒弃了凯恩斯的这种基本论点，以为只要算出充分就业所能达到的储蓄额，然后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罗宾逊谴责这种理论，认为它恢复了萨伊定律，因为使“微观理论也就可以再滑进老槽了。”

应当说，罗宾逊对萨缪尔森的这些非难是颇有道理的。萨缪尔森用力学上的均衡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把供求均衡说成是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的正常状态，只不过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及生产无政府状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但是，罗宾逊虽然力求从时间变化去分析某些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比较符合现实一些，但她的历史观也不是科学的，它只不过是企业家之投资决策这种生意经的一种概括。它只对投资市场风云变幻这种现象形态作了刻画和描绘，丝毫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投资的规律及其实质。这种历史观仍然是十足的庸俗货色。她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最大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她也没有根据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借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从这些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对它们进行研究。罗宾逊要能真正驳倒萨缪尔森，就必须坚决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上来。

四 “资本论争”：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方面的分歧

大家知道，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力论”。他们否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把它说成“财富的储存”、“生产的要素”，认为它同劳动、土地、组织一起，共同参与价值的创造，所以价值似乎应该根据每个生产要素在创造这些价值中的贡献，即根据它们的边际产品来分配：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组织——利润。他们认为，这些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统一与和谐，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的生产中彼此合作，并各自从国

民收入中取得相当于其边际效率的收益。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是井然有序，“天公地道”的。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收入大量积聚，而工人阶级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地不断爆发，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充分暴露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不再能够自圆其说，在政策措施上显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它试图在关于消费和投资的心理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解释。他确认，投资是促使就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凯恩斯关于强调投资的重要作用的这一论点，两个剑桥都是同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凯恩斯并没有排斥边际理论，而与之妥协，为接受“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物”这一基本前提，以便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于资本和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经济政策辩护。在这里，两个剑桥则有着明显的分歧，论争十分激烈。

凯恩斯同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理论相妥协，使美国剑桥派有根据地信奉这一理论，把凯恩斯主义同新古典理论综合调和起来。他们坚持新古典派的边际产品学说、收益递减规律，认定各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各得其边际产量，因而收入分配不均理所当然。萨缪尔森公然声称：“分配之谜——即如何在两个(或更多的)协作的生产要素之间分配它们共同生产的总产品——可以利用边际产品的概念而得到解决。”^⑥他还断言：通过生产要素共同的互相依赖的供求市场作用，可以得到这样的分配模式：工资 = 劳动的边际产品，地租 = 土地的边际产品，其他生产要素以此类推；“这个分配办法把百分之百的总产品分配给所有的生产要素，不多也不少。”^⑦

美国剑桥派索罗编制的“总量生产函数”，萨缪尔森捧得很高，它的假定前提就是：(1) 市场机制(供求调节、价格变动等)的作用是完善的，能使劳动和资本都能充分利用，并使全部储蓄用于投资；(2) 随着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其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3) 各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都由与其相等的边际产品来决定，即生产要素的报酬率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4)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可能性。十分明显，索罗的理论更是十足地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说，是完全遵循边际生产力理论的。

英国剑桥派则不同，他们极力反对美国剑桥派的资本、生产和分配理论，对“边际生产力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反对回到自由竞争会“趋向于使劳动者获其劳动所创造的一切，使资本家获其资本所创造的一切，使企业家获其协调职能所创造的一切”的旧理论中去。罗宾逊指责这种旧理论为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辩护，认为必须抛弃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她在论战中，阐明了她的两个重要论点：

第一，虽然从形式上说，人们用来工作的工具和手段，即资本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似乎对生产有贡献。但资本本身是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故不能把资本看作生产要素。在舍象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即劳动。

第二，作为商品的资本，其价格不管资本家看来意味着什么，都应该用一种和其他商品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具体说来，资本和所有商品一样，都应该用斯拉法“还原为有时间的劳动量”的方法来确定价格，即劳动成本加上利润因素。

显然，罗宾逊这些论点同上述萨缪尔森和索罗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罗宾逊坚决反对边际分析法，尤其是批判了萨缪尔森等人将均衡“要素”价格同“要素”的边际产品联系在一起

作法。正因为这一点，一些经济学家把新剑桥学派在论争中的胜利，及其论点愈益广泛地为人所熟悉和接受，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相对比，称之为“反边际革命”。

罗宾逊主张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回到古典学派特别是李加图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国民收入在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上来。在她看来，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同经济活动水平（增长速度）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有关。而且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态因素。她论证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着投资率的增长而增长，确认经济增长促使利润增长，承认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并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极大障碍，因此，她要求收入均等化，支持保障正常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的某些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她接触到了阶级分析（尽管很不深刻），接受了马克思的某些论点，并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呼吁。正因为如此，使她赢得了“左派”凯恩斯主义者的称号。

毫无疑问，罗宾逊等对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观点，对工人改善生活要求的合理性所作的论证，对边际生产力论的抨击，都是比较激进的。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否定或者“遗忘”古典学派的情况下，罗宾逊强调经济理论应当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当加以肯定。但是，新剑桥学派并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因此，他们提出的比较平均分配收入的要求，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⑩马克思这些批判对罗宾逊恰好十分贴切。要真正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单从分配方面提出“平均化”的要求，最多只能作些改良而已。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关于“后凯恩斯学派”这一词，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有的泛指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有的主要是指新剑桥学派。在本文中，所谓“后凯恩斯学派”，是泛指凯恩斯主义而言。

② 如托宾就是以《英国剑桥同麻省剑桥的论争》(Cambridge(U·K)VS. Cambridge(Mass))为题，撰文对罗宾逊提出的各项责难进行答辩。此文刊登在《公共利益》杂志，1973年春季号。后被选编入《经济学的最近进展：读本》(美国经济学会编，1974年版，第39—4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3页。

④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本文以后引用的凯恩斯的话，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⑤、⑧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20页。

⑥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64页。

⑦ 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第11版，第210页。

⑧⑩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册，第225、23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99页。